

# 《海外藏中国宝卷汇刊》编纂的价值与意义\*

□ 李永平 党从心

**摘要:**与敦煌学一样,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宝卷学同样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宝卷文献流散世界各地,部分稀见文献集中于东京、京都、波士顿(哈佛大学)、伦敦、圣彼得堡等地。目前海外有近20位汉学家致力于宝卷研究。海外中国宝卷收藏在东亚、欧洲、北美等地区,其中东亚的日本收藏孤本、稀见版本最多,欧洲次之,北美再次之。宝卷是“文化文本”,涉及民间传统、口头诗学、民间宗教史、人类学、社会学、故事学、域外中国学、民间曲艺、绘画、方言等等。作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中国宝卷的海外收藏情况是近代西方世界体系赓续中的“中国镜像”,其流失的历史背景、整体面貌,就是近现代的中外关系史的另一表现。

**关键词:**宝卷;海外汉学;敦煌文献

**中图分类号:**I106.7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23.04.001

## 一、西方汉学传统与“他山之石”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sup>①</sup>陈寅恪的“预流”说,既包括20世纪初全新的研究领域——敦煌学,也包括了西方汉学的学术方法和思潮。

遗憾的是,通过贸易、馈赠、焚毁破坏或者劫掠等,大量中国珍贵古籍遗失或者流落海外。近现代翁万戈的藏书,即翁氏藏书,其始祖翁心存和第二代传人翁同龢,分别是清朝两代皇帝的老师。因此,翁氏家族成为民间藏书大家。翁同龢五世孙翁万戈,1948年将翁氏藏书运到美国。2000年4月,上海市政府出资450万美元将翁氏藏书共计80种542册入藏上海图书馆,其中仅宋刻本就达11种,这批藏书被誉为海外文物文献分量最重的一份藏书。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

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连续两天在圆明园到处放火,贮藏于园内文源阁的《四库全书》同毁于火,烬余散本也被侵略者掠到国外。日本历次侵华战争造成我国文献资源损失惨重:中日甲午海战、日俄战争、抗日战争期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07年至1935年在中国建立了29家图书馆搜集中国文献)劫掠了大量中国珍贵古籍。<sup>②</sup>

随着本课题调查的推进,与当初的敦煌学一样,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宝卷学同样是一门世界性的专门学问。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宝卷文献流散世界各地,部分稀见宝卷集中于日本东京与京都、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英国伦敦、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地。世界近20位汉学家致力于宝卷研究。其中,日本汉学家起步最早,且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以泽田瑞穗、吉冈义丰、小南一郎、柯凌旭为代表。

可惜的是,尽管现代以来,顾颉刚用民俗材料、陈寅恪用诗文证史、李济运用考古材料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266)的阶段性成果。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② 台湾世新大学《信息传播与图书馆学》2000年第7卷第2期发表李彭元《日本历次侵华战争造成我国文献资源损失之研究》,将日本对我国文献资源的掠夺情况做了统计。

等<sup>①</sup>展开整体的系统研究，但是即使今天，我们的学术依然存在“史料丰富而史学贫乏的奇怪局面”<sup>②</sup>，“重发现轻发明”，在宝卷研究上，由于学科划分的人为扰动，国内宝卷研究重要力量多集中在中国俗文学、佛教宝卷与民间教派等少数几个领域，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同时，由于多语种阅读研究能力的局限，对海外宝卷研究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非常窄的领域里。笔者近年通过调查、翻译等工作，拟推出“海外中国宝卷研究丛刊”10种<sup>③</sup>，试图改变研究现状。

## 二、绘制海外中国宝卷收藏“地图”的价值与意义<sup>④</sup>

哈佛大学伊维德（Wilt L. Idema, 1944—）教授撰稿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五章“说唱文学”部分，详细介绍了《刘香宝卷》《香山宝卷》《何仙姑宝卷》。在国内，最早发现并肯定宝卷价值的是顾颉刚、郑振铎等文史学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当时流落海外的敦煌文献的影响，顾颉刚、郑振铎、向达等人开始收藏和研究宝卷。郑振铎自1920年代末开始在上海搜集到大量宝卷。

近一百年来，中国宝卷著录编目中涉及部分海外收藏宝卷文献资料。傅惜华编《宝卷总录》（1951年）除对国内公私机构所藏的宝卷著录之外，还对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藏的宝卷进行著录编目。2000年，车锡伦先生《中国宝卷总目》（修订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前人编目的基础上，著录了部分海外藏中国宝卷：根据泽田瑞穗著录日本藏本209种，根据李福清（Riftin, Boris Lyvovich, 1932—2012）等人评介李世瑜《宝卷综录》的论文著录了莫斯科国立列宁图书馆藏明代宗教宝卷7种，根据司徒洛娃（Elvira S. Stulova, 1934—1993）《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宝卷评述》著录18种明

清宝卷，又从法国学者苏远鸣（Michel Soymie, 1924—2002）处得知其所藏明代宝卷12种。

根据车锡伦、马西沙、泽田瑞穗、李福清、司徒洛娃、伊维德、相田洋、崔蕴华、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 1982—）、陈安梅、山下一夫、霍建瑜、徐巧越、乔现荣、范夏苇等人的蒐集、梳理、研究，海外中国宝卷主要收藏在东亚、欧洲、北美等地。其中东亚的日本收藏孤本、稀见版本最多，欧洲次之，北美再次之。学者大渊慧真20世纪30年代搜集明清宝卷10种。<sup>⑤</sup>1939年9月，为了全面侵华，日本近卫内阁设立“财团法人国家调查机构”东亚研究所，在中国进行民间宗教信仰和民俗调查。此间搜集的宝卷战后归入日本国会图书馆，共34种，44个版本。这一时期，日本京都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搜集中国宝卷112种，其中明及清初刊本宝卷和抄本宝卷6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急于了解宗教信仰和民俗习惯等中国情况。1939年9月，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成立东亚研究所，并在许多地方设立分所。此间，许多“支那学家”被派到中国各地进行民间宗教调查。塚本善隆从1928年到1945年，曾先后七次来华从事宗教社会调查。酒井忠夫于1935年大学毕业后到上海任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专门调查中国的秘密宗教结社。泽田瑞穗和吉冈义丰也来中国留学，还组织过“风俗研究会”，收集到不少宝卷资料。继泽田瑞穗之后，仓田淳之助也是日本学者中搜集中国宝卷较多的一位，其搜集的宝卷现藏于京都大学。二战后，日本学者们开始研究这批宝卷，出现了酒井忠夫、大渊忍尔、泽田瑞穗、吉冈义丰、仓田淳之助、塚本善隆等一批宝卷收藏家和研究者。吉冈义丰收藏宝卷4种，湊德忠个人藏5种（现藏于冲绳国际大学），大渊忍尔收藏6种，日本佛教大学的研究者藏宝卷12种，矶部彰藏宝卷10种。

越南汉喃研究院收藏中国宝卷的重刻本有两

① 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65—167页。

②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见《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79页。

③ 其中第一种是笔者与伊维德、白若思等编的《海外中国宝卷收藏与研究导论》，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出版。

④ 参见李永平、白若思：《绘制海外中国宝卷收藏“地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23日。

⑤ 参见李永平、白若思：《绘制海外中国宝卷收藏“地图”》。

种：一是河内报恩寺《香山宝卷》（1772年），二是河内玉山三圣庙《观音济度本愿真经》（1881）。通过这两种版本与其他明代宝卷版本的比较，李福清院士与白若思论证河内重刻本应为15—16世纪的版本。<sup>①</sup>宝卷在越南传播的情况很独特，因为对本地民族文学与信仰有较大的影响，不像其他东南亚国家，如泰国与马来西亚，宝卷的传播刊刻基本限于当地的华人圈子。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两部宝卷都讲述妙善公主修道的故事。这种类型的故事在越南传播甚广，是当地观音菩萨信仰的一个部分。越南用喃字编撰的妙善公主故事的韵体神传已出现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据白若思考证其最早的版本改编自中国神传小说，而不是《香山宝卷》。然而，该小说本来与《香山宝卷》也有关系。后来《观音济度本愿真经》也传入越南，现存河内重刊本的原版注为1870年，应是在广州刊刻。越南也出现了几部《观音济度本愿真经》的改编本，一直流传到现在。可见中国宝卷在越南传播的情况比较复杂。

欧洲大陆收藏的宝卷并不多，但有几部早期的珍本甚至孤本。笔者编著《海外中国宝卷收藏与研究导论》时有对欧洲收藏研究情况做详细概括。<sup>②</sup>特别指出的是，莱比锡大学柯若朴（Philip Clart）教授收藏有光绪癸未年（1883）《白鹤传》（《新刻韩仙宝传》）的一个版本，笔者获赠该版本后，对该版本进行了比较研究。<sup>③</sup>

以往，研究中华文化的学者，大多据古代典籍，特别是传统儒家经典来立论。从整体中国文化发展来讲，这只是反映了少数精英阶层的研究取向，中国民间社会的精神与信仰同样自下而上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走向，所以逐渐有学者将佛、道和民间信仰文献等纳入视野，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第一、第二卷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翻检中国思想史，南宋初流行《太上感应篇》，明末常见的《了凡四训》《迪吉录》，清中

叶有《玉历钞传》（后有《玉历宝钞》《玉历至宝钞》等称呼），这些民间广为流行的文化传统，其价值取向对中国底层人的精神世界影响很大。神话观念认为，人类“罪愆”会导致灾异、瘟疫和社会动荡，甚至让末日劫难到来。在清代，职业宣讲者在讲授康熙《圣谕》时会加入大量善书中的故事以期劝善禳灾。宝卷中有《救劫宝卷》《家谱宝卷》《觉世真经》等相当一部分善书，力劝民众修行佛道，一心向善。民众这一“受迫害的想象”与封建社会后期政治动荡、灾害频仍乃至社会内卷直接相关，受迫害的想象极易启动替罪羊机制。替罪羊机制的存在，使宝卷成为禳灾文本。人们对瘟疫、天灾、疾病、战争的恐惧，对吉祥美满的渴望，使其自觉担责，成就了自我“修炼”与以人为“善”的道德宗教。修禳“污染”，禳解“灾异”是禳灾叙述与“做会”仪式发生的神话观念基础。<sup>④</sup>

### 三、宝卷研究任重道远

宝卷研究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顾颉刚在发起《歌谣周刊》、主持孟姜女故事的讨论时，曾全文刊载了永裕谦的《孟姜仙女宝卷》刊本。郑振铎先生认为宝卷是“讲唱文学”，他在1927年发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第七节“巨著的发现”，首次把变文、宝卷（佛曲——变文和宝卷）、弹词、鼓词、民间戏曲等列为开拓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sup>⑤</sup>

#### （一）日本学者的中国宝卷研究与整理情况

宝卷的搜集与研究，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者们率先开始整理研究宝卷，出现了第一代（20世纪初）学者塚本善隆、仓田淳之助、泽田瑞穗、酒井忠夫、湊德忠、吉冈义丰、太田辰夫等学人。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第二代表人物有相田洋、小南

① 参见 Rostislav Berezkin and Boris L. Riftin, “The Earliest Known Edition of The Precious Scroll of the Incense Mountain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recious Scrolls and Buddhist Preaching,” *T’oung Pao* 99. 4–5 (2013): 445–499.

② 李永平、伊维德、白若思等编：《海外中国宝卷收藏与研究导论》。

③ 李永平、李婷宜：《湘子宝卷若干问题研究述要——兼论德国汉学家柯若朴藏〈白鹤传〉的文献价值》，见《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第十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62—177页。

④ 李永平：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报告《禳灾与救劫——宝卷叙述的人类学研究》，拟由商务印书馆2023年出版。

⑤ 郑振铎：《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一郎、浅井纪、砂山稔大塚秀高、矶部彰、矶部佑子等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第三代代表人物包括松家裕子、二阶堂善弘、太田出、上田望、柯凌旭、山下一夫、佐藤仁史等学者。日本学界宝卷研究成就最突出的是泽田瑞穗。其中其《增补宝卷的研究》将宝卷的历史分为“古宝卷时代”和“新宝卷时代”两个大的发展阶段。该书还介绍了个人收藏的300多种宝卷，对每一种宝卷都提供了详细的内容提要以及有关作者和刊刻等方面的信息。

## (二) 欧美学者的中国宝卷研究与整理情况

欧美学者对中国宝卷的研究起步于19世纪初，由于当时国内外学者对民间文学价值的认识不足，该研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后续发展也较为缓慢。在国内学者郑振铎等人的启发下，更多欧美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宝卷。

总体而言，欧美学者发表的综述研究不多。2012年，伊维德首次对宝卷研究的英文成果进行了梳理。该研究由霍建瑜译成中文见录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宝卷汇刊》。<sup>①</sup>2016年，该文的增补版由孙晓苏重译发表在《中国宝卷国际研究论文集》。<sup>②</sup>伊维德和孙晓苏还合作了另外一篇宝卷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英语学界中国宝卷研究、翻译与书评文献述略》，<sup>③</sup>该文较为详细地列举了目前为止作者所知的英语学界中中国宝卷的研究状况及其成果。对此，伊维德撰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宝卷是西方学者特别关注的文类之一。<sup>④</sup>另外，孙晓苏翻译伊氏的《英语学界中国宝卷研究、翻译与书评文献述略》主要向中国读者介绍了1950年至2019年欧美学者用英文发表的中国宝卷研究、翻译成果

以及其书评。<sup>⑤</sup>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应该是东亚以外最早注意宝卷的人。欧大年是继荷兰的汉学家高延（Jan Jacob Maria de Groot）之后西方研究中国教派宝卷的学者。早在1976年，他就出版了《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sup>⑥</sup>，这是第一本以西方语言系统地介绍明末清初新教派的著作。1999年，欧大年发表了著作《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sup>⑦</sup>。

欧大年的学生那原道（Randall L. Nadeau）同样致力于宝卷研究。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明代流行教派：罗清及其“无为教”》讨论罗清及其著作，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所有宝卷演出都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那原道的《中国流行宗教文学的文体风格：宝卷》认为宗教性宝卷和非宗教性宝卷都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这一研究超越地域局限，一针见血很有见地地指出宝卷编创背后的动力机制。如欧大年教授一样，一直潜心研究中国晚明教派的学者还有不少，如石汉椿（Richard Hon-Chun Shek）和韩书瑞（Susan Naquin）等学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从社会历史学角度研究晚期中国社会。韩书瑞在专著《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中认为王伦和他的信众似乎并无经卷可依。而其《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则大量引用黄育榷《破邪详辩》里的教派经卷来重现教徒们的信仰。

另外，英国杜德桥（Glen Dudbridge）、荷兰汉学家伊维德对《香山宝卷》中的妙善传奇的主题和不同国家相关主题做了比较研究。整体上以杜德桥、伊维德为代表的欧洲汉学家继承了欧洲汉学注重语言训练和文本解读的传统。伊维德教授还翻译了包括《沉香宝卷》《香山宝卷》《善才

① 伊维德：《宝卷的英文研究：文献调查》，见霍建瑜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宝卷汇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15页。

② 该部分主要参考了伊维德《宝卷研究的英文文献综述》（增补修订版），孙晓苏译，见《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33—48页。

③ 伊维德、孙晓苏：《英语学界中国宝卷研究、翻译与书评文献述略》，载《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1—16页。

④ 伊维德、张煜：《英语学术圈中国传统叙事诗与说唱文学的研究与翻译述略》，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1期，第6页。

⑤ 伊维德、孙晓苏：《英语学界中国宝卷研究、翻译与书评文献述略》，第1—16页。

⑥ 同上，第2页。

⑦ 同上。

龙女宝卷》《孟姜贤女宝卷》《雷峰宝卷》《灶君宝卷》《目连三世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平天仙姑宝卷》《刘全进瓜宝卷》《鹦哥宝卷》《老鼠宝卷》《救劫宝卷》《黄氏女宝卷》《三茅宝卷》等在内的中国宝卷 20 余种。2013 年伊维德和管佩达 (Beata Grant) 合作翻译了《目连三世宝卷》，出版了著作《逃离血湖地狱：目连和黄氏女的传说》。2015 年伊维德教授翻译了《平天仙姑宝卷及其他几部河西宝卷》<sup>①</sup>。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经过郑振铎、向达、恽楚才、魏建猷、李家瑞、孙楷第、佟晶心、吴晓铃、傅惜华、胡士莹、李世瑜、关德栋、马西沙、车锡伦、濮文起等几代人的努力，国内宝卷的调查、整理编目取得了显著成绩。近年王昊、王文仁、李永平、白若思、周晓兰、韩洪波，包括车锡伦先生本人都在不停地为《中国宝卷总目》补遗。这对摸清中国宝卷存留的种类、形制、历史、地域等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不断有新发现，这一工作还在继续。

客观地说，既有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正像笔者之前总结归纳的那样<sup>②</sup>：缺少全面的整体性研究成果。宝卷是“文化文本”，其中的一部分宝卷是宗教教派的经卷，一部分是民间信仰的故事卷，还有一部分是“仪式卷”，有图像，有音乐，有叙述程式，有禳灾仪式，有宣卷家族或团体。一方面，研究俗文学、民间信仰、宗教教派、社会史的学者，局限于学科归属，对宝卷的研究各执一端，刻意强调某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宝卷分布广泛，地域特色明显，近年宝卷研究以地域特色划分，强调地域特点而忽视了整体特性。目前缺乏以独立的、综合的眼光考察宝卷的历史、社会功能、传播变异等

的整体性的研究成果。

目前的研究缺乏问题意识。明清时代，民众在如此广阔的地域编创、传抄、刊印、宣讲种类繁多的宝卷。宝卷存在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民众参与宣卷活动的动机又是什么？学者以“劝善”和“娱乐”概括宝卷的功能，从文化大传统角度看，宝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故事，笔者认为宝卷的演说仪式是参与社会整合的实践活动，祈福禳灾才是宝卷说唱的文化动力。

禳灾演述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宝卷演说禳灾机制的研究，拓展文学社会治理研究的空间。宝卷的编创、抄写、宣卷都是仪式实践。在这些实践活动中，我们看到社会群体、疾痛的个体与其关联的族群、文化、生态环境、大小传统交流互动，彼此疗癒、整合形成民间礼俗的过程。这一过程研究由于涉及社会学、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口头传统等学科，而且要做一定规模的田野调查，整个调查研究较为滞后。

受学科分类影响，跨学科交叉研究滞后。宝卷是“文化文本”，涉及民间文学、口头诗学、民间宗教史、人类学、社会学、域外中国学、民间曲艺等等。由于宝卷研究队伍的新老断层现象较为突出，以往研究的惯性还在持续，文献考证还居于研究主体，学科间的交流互动不足，跨学科、新方法、新角度、新视野研究处于边缘状态。

总体而言，在文献整理上，国外藏中国宝卷的调查、整理、研究成果的翻译介绍滞后。中国大量珍贵的文物、文献、档案流落海外。作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中国宝卷的海外收藏情况是近现代西方世界体系赅续中的“中国镜像”，其流失的历史背景、整体面貌，就是近现代的中外关系史另一种表现。

(李永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党从心：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 李永平、范夏苇：《从小说到宝卷：小南一郎的俗文学研究路径》，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第 44—53 页。

② 参见濮文起、李永平编：《宝卷研究·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443—444 页。

## 本期重要作者简介

李永平，古典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日本京都大学访问交流。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组委员、文学人类学辑刊《文化文本》执行主编等职。主要从事俗文学、文学人类学跨学科研究，深入探讨民间禳灾与驱祟活动，注重整体文学观，特别是借鉴文学民族志理论，揭示宝卷演述中转移、祓除、禳解“天谴”的社会功能。在《光明日报》(理论版)、《文艺理论研究》、*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等中英文报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著有《包公文学及其传播》(简体版和繁体版)、《禳灾与记忆：宝卷的社会功能研究》《丝绸之路与文明交往》《文化大传统的文学人类学视野》《古典学之文化大传统视野》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海外藏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266)。



《国际汉学》微信公众号：  
北外国际汉学



北外学术期刊  
微信公众号

# Abstracts

(No.4, 2023)

##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Baojuan in Overseas Collections*

Li Yongping & Dang Congxin

**Abstract:** Just like Dunhuang studies, *Baojuan* studies, which was born in the 1920s, is also a worldwide discipline. Since the 1920s, Chinese *Baojuan* literature has been dispersed around the world, and some rare documents are in Tokyo, Kyoto,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London, St. Petersburg, et al. At present, nearly 20 sinologists abroad are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Baojuan*. The overseas collections of Chinese *Baojuan* roughly cover those in East Asia,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other areas, among which Japan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collections of rare editions, followed by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Baojuan* are “cultural texts,” involving folk traditions, oral poetics, folk religious histor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storytelling, extra-territorial Chinese studies, folk *quyi*-art, painting, dialects, etc. As an extremely valuabl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easure, the overseas collection of Chinese *Baojuan* is a “mirror of Chinese Image”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system,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overall appearance of its loss is another expression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Baojuan*, overseas sinology, Dunhuang documents

##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Title of *Qi Wu Lu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Yu Xuetang

**Abstract:** There are ambiguities in the title of *Qi Wu Lu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which are categorized into the following: the equality of all things, the doctrine of the equality of all things, the view of all things or the doctrine of things as unity,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making all things equal, and all things being created equal. Chad Hansen’s English version is commendable because it contains the double meaning of the title. Graham’s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Billeter’s English interpretation reveal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Qi Wu Lun*, which interprets “Qi Wu Lun” as a way of seeing things, a way of thinking or a way of cognition. The translator’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standpoint influence the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to a large extent.

**Key words:** *Qi Wu Lun*, qi wu, qi lun, qi tong, ways of seeing things, equality

## Staunton and H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 Tsing Leu Lee*

Wang Dongmei & Wang Kefei

**Abstract:**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writing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reasons for Staunton’s translation of *Ta Tsing Leu Lee* (大清律例, *Qing Dynasty Laws*). It is found that the immediate motivation came from Staunton’s pursuit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n China soil, and the deeper reason was his ambition to become an envoy to China heading the diplomatic mission to be sent by Britain. In his translation, he attempted to present the English version as an authoritative and authentic specime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e manipulated the translation by comprehensively reviewing Chinese law and civilization, and by using Western legal terms such as “penal” to express a totally different Chinese legal system with his free translation method. His English version later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Westerner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aw